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23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回忆“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东江	刘立道(14)
“三一八”惨案纪实	李世军(20)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商闻实(26)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程思远(46)
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	侯定远整理(69)
陈仪被扣内幕	陈 达(75)
綦江惨案亲历记	刘 非(79)
回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	裴文中(87)
外商水线公司的入侵和我国电信职工 的反帝斗争	厉积良(95)
有关北洋时期电信事业的几件事	吴梯青(123)
关于侵华法海军将领孤拔之死的史料 “缺嘴将军”	李世甲(135)
对《“缺嘴将军”》一文的补正	林勋貽(138)
中法马江战役拾遗 ——记杨金宝击毙孤拔的战绩	倪孔铨(139)
关于孤拔之死	梁巨祥(141)

上海战役概述	刘剑石 邹彬等(146)
蒋军一二三军在京沪杭线上被歼经过	单 栋(166)
青年军三十七军在上海战役中的被歼	陈廷祺(182)

回忆“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工作是规划工人运动，发动工人斗争。因此，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开始组织八条铁路（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的罢工，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坚持二十五天的开滦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计划在长辛店先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其他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由于郑州地处适中，所以决定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方区委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了今后的斗争方向。鉴于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路组织政治斗争，即在斗争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策划具体方案以期贯彻，并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机，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

“二七”大罢工详细经过可参阅一九二三年三月北方区委工人周刊社印行的《京汉工人流血记》。这里，我只就个人亲历事实，简略说明如下：

“二七”罢工的组织领导。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区委会议上，守常同志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由文虎负责。”

《新学生》第十四期李守常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守常在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谈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到武汉讲学的事）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同志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同志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人手不够。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他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想无意外？”守常同志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

当时，我们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发事变，所以按原定计划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筹备是公开进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都连续在各大报刊登大幅广告，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见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同时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通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诡计多端、惯搞阴谋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并且假惺惺地为工会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免费乘坐，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的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以及赠送锦旗以表示支持工会成立，但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加紧反革命部署。

一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总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黄麟书、梁鹏万，津浦路姚佐唐、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游天洋、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沪杭甬

路沈干城；沪宁路孙津川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总工会代表五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有重大政治阴谋，准备实行镇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火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我们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听后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以下简称京总）党团会议负责人有：罗章龙（党团书记）、史文彬（以下为党团成员）、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项德隆（即项英）、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这些人分住在郑州的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

拔弩张，冲突之势已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公开发动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破坏阴谋，并表示工会的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工人周刊》等报纸刊布消息）；另一方面党团会议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他已接到曹錕密令，又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已十分紧迫。李求实同志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佩孚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京总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会场设在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先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意欲制造血案。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订的饭菜，亦不准开售，代表一时完全

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总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代表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其大要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委工委书记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动、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总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总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并提出要求条件五条（详见《京汉人流血记》第二章）。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的通电：

全国各工团均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惟〕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工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类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詎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

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轨、电报、电话、火车头、压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为预防破坏罢工行为，决定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名册共计三万人。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

京汉全路罢工总指挥部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三日晚，我同罢委会主任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五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秩序井然。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京长辛店，但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以借此迷惑敌人。而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是放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七日早上六点，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等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深夜，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同志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人的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劳动组合书记部小刘（刘伯青）急乘交通专车赴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时，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汝明、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形势非常紧迫,极想书记部能出主意。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工人大队高举标语旗帜,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浩大!

我和葛树贵同志领队前进,杨诗田同志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同志持文告向前搭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两同志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蜂拥前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均受伤倒地。在这次屠杀中,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名、刘宝善、赵长润等五同志,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同志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经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工作。

我负伤后,经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传令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子贞、杨宝昆同志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工会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宝昆弟兄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日）接到京汉各路各站报告，知道江岸发生重大屠杀事件，工人死伤众多，保定、信阳、郑州各站同时发生格斗与伤亡情事，据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肖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群众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被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被捕，壮烈牺牲，律师施洋同志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肖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真（铜匠）、梅才咏（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言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同志。信阳工会委员、司机胡传道，因拒绝复工，反对军阀镇压，竟惨遭敌人砍去左臂。郑州亦将工会负责人捕去关押，诱逼工人复工。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亦被曹锟捕去，罚以站牢笼的酷刑，沿线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君（名不详）、梅启发、吴彩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炳、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承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赵长润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十二小时内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因此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和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遂决定忍痛复工。会上曾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在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

大的损失，没有采纳。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决定：(1)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增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2)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3)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4)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专人到京汉沿线各站及其他铁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分别在北京、石家庄、丰台、天津等处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也推派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等，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议部署各项工作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暗自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猛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劳动组合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北京卫戍司令)在北京通衢大道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劳动组合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捕去一同志；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抢去；《工人周刊》被查封，捕去二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负责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真是缙骑密布，陷井纵横，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

在北京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进行筹备，于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作报告，到会者五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坛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群情激奋，誓为争取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及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篇，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如海员总工会致大会电云：“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信，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枪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同志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人员在集体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在“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他们多次，但都得不到确实口供。法官追问他们罢工受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是什么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

其他。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就可以释放你们。”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响导》二十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纪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纪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收集资料、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复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我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大量图片。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和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排印其间，还把德国革命诗人海涅的诗《宝剑火花歌》和自编的诗句补在空白处。全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同志负责（四川人，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北方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封面为三色套版，绘一挥

大锤的工人，封面题字是由宋天放书写的。编成后，由文虎写了自序，高君宇写了一篇后记。当时由于印刷工人不多，且都是业余的义务劳动，人手不够，于是我们两个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拼版、摇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员同志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组稿写稿到排字、拼版、印刷的全部工序。后来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干得很好。

《京汉工人流血记》于三月底在北京初版，约印五千本，后改由广州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全国时期多次销毁，列为禁书，解放后还见到几种版本：一、由北大印的第一版（湖北省博物馆保存一册）；二、一九二六年广州印刷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藏）；三、郑州二七纪念馆解放后重印本，这个版本同原来的排法不同，亦有残缺和讹误处。

一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响导》上有专文介绍此书，“二七”后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在五月一日复刊时登了该书自序并作了介绍（63期）。

综计自《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后，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的，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件、历史事实不符合，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系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名义所编印，其内容多虚妄不实，以讹传讹，并以此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纷，国际为此有一正式电报给中共中央转北方区委，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二七”大罢工的评价。电文云：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悉你们为反抗军阀——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忠仆而血战，敢以无限的敬意祝贺你们从此

以后不要从你们手中放松赤色工人的标帜，用你们困苦的最后罢工手段，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反抗世界的压迫者。

暂时你们虽仅少数工人做了反抗军阀的示威，但接踵而起快来加入你们的队伍反抗军阀的同志，何止千万数！

你们最近罢工的口号“工人自由集会 and 结社”，你们当努力的坚持到底，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你们曾经开始了斗争，实在是恰当的，你们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他的忠仆——本国的军阀压迫之下唯一的急务，是要打击中国资产阶级的，增加自己团体的斗争力以达中国人民的解放。

你们的仇敌——军阀在汉口和北京，屠杀了你们的同志，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困苦的和你们向现有的军阀共同作战了。你们从此以后同中国共产党当更亲密，并且由斗争的经验，可以了解必须与这党享共同的祸福。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护铁路工人的利益，乃是为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而奋斗的。

你们快同中国共产党一致，快同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结合，徐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共产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作“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共产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一方面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写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一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党的“三大”对“二七”罢工作了全面的总结，会议中也有争论，我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谈。

一九七八年十月